

落入“高收入陷阱”的香港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 林夏如 為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撰稿 2017-06-29 (www.ftchinese.com)

(編者的話：台灣出生、美國受教育，林夏如曾是高盛集團亞洲區最年輕的合伙人。過去的投行工作，讓她以香港為家，操盤亞洲投資決策。在香港移交主權20周年前夕，她寫下身為一個台灣移民，對香港的觀察和期許。)

1992年我隻身到香港，一轉眼已經25年。香港回歸20周年紀念日對我來說是特別有意義的，那時候有些人雖然因為回歸而出走移民，但我因為加入投資行業而決定把香港當做自己的家。這是個改變我人生的決定：我在香港進入互聯網風險投資行業、也成為三個香港小孩的媽、後來進香港大學念政治經濟學並開始做老師。我清楚地記得，在回歸前夕，儘管香港政府更迭和對“一國兩制”實驗充滿着不確定性，但大家的心情非常樂觀，因為“港人治港”終於要實現了，而當時沒有多少人擔憂2047年以後的事情，只期盼“高度自治”得以成功實踐。

二十年時光飛逝，今年7月1日林鄭月娥就任香港行政長官（特首），她是香港歷史上首位擔任這一最高長官的女性，理應贏得掌聲。然而，在這樣歷史性的時刻，日益極端化的香港社會並未有太多歡呼與喝彩。香港的行政長官並不具備廣泛的民意基礎，林鄭月娥自身的受歡迎程度亦有限。事實上，今天不少香港年輕人們認為香港價值和自主性早已經被侵蝕、“兩制”早在2047年到來之前就已經不復存在。

在香港年輕人眼中，今年3月參與行政長官選舉的3位候選人都不意味着改變，也缺乏合法性。林鄭月娥獲得了1200名選委的777票，比五年前當選的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的689票要多，但她依舊未能贏得泛民主派的任何支持。在現行香港立法會的運作框架下，政府若不能取得跨政治陣營的支持，政策將難於推進。此外，林鄭月娥在社會福利、環境保育和政治改革方面都持強硬保守態度，三年前“雨傘運動”中亦拒絕回應學生的訴求，十年前也是她強硬面對“保衛皇后碼頭”運動示威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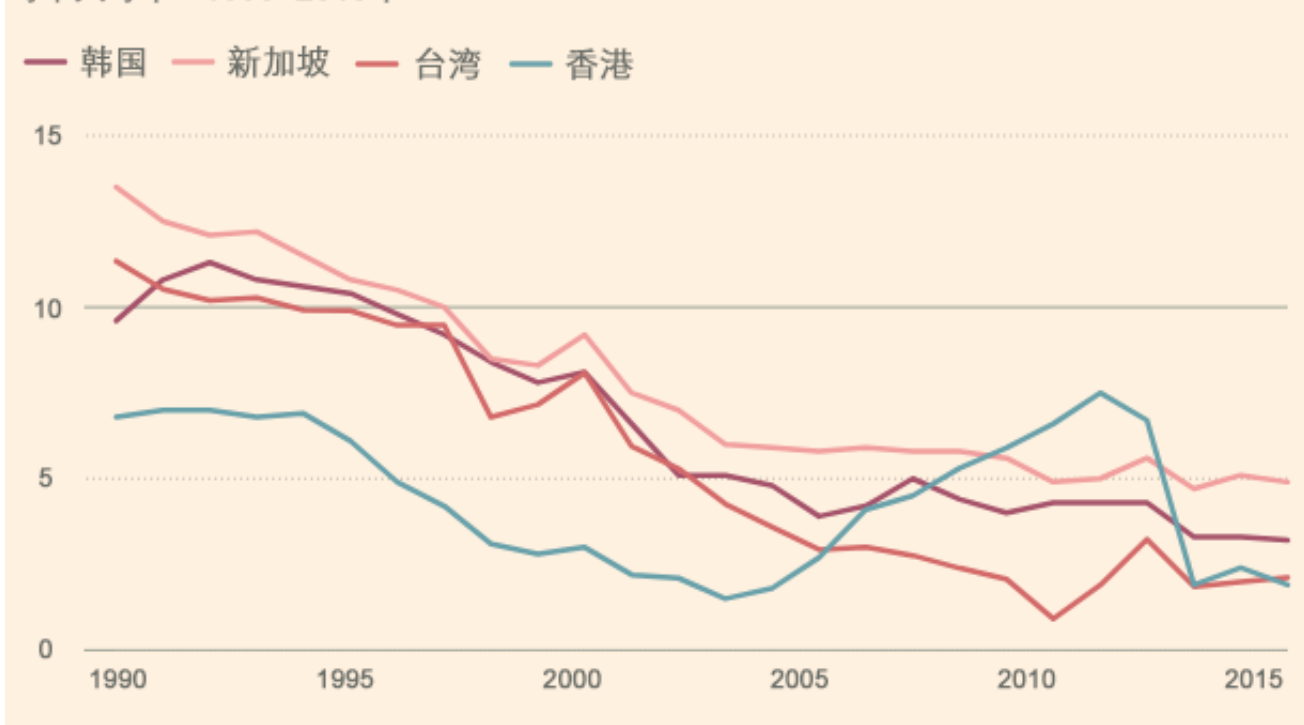
當前，香港政府最亟需應對的問題其實是在經濟領域，因為正是經濟問題讓社會加速極端化。

日益分化的社會

香港經濟增長正在放緩，人口老齡化問題突出，資產持續膨脹。上世紀70至80年代香港人均GDP增速維持在6%以上，而過去5年里這一指標僅為3%。勞動階層和年輕人的就業機會有限，因為香港產業結構單一，就業市場無法多元化。1981年，香港人口年齡中位數是26歲，回歸前一年，這一數字已經超過34歲了，今天更上升至44歲，在“亞洲四小龍”中屬最高。儘管在過去20年中有大量新移民到來，過去10年里人口增長速度有過短暫回升，但香港的人口成長速度依舊緩慢（下圖圖一）。

亚洲四小龙人口自然增长对比

每千人每年，1990~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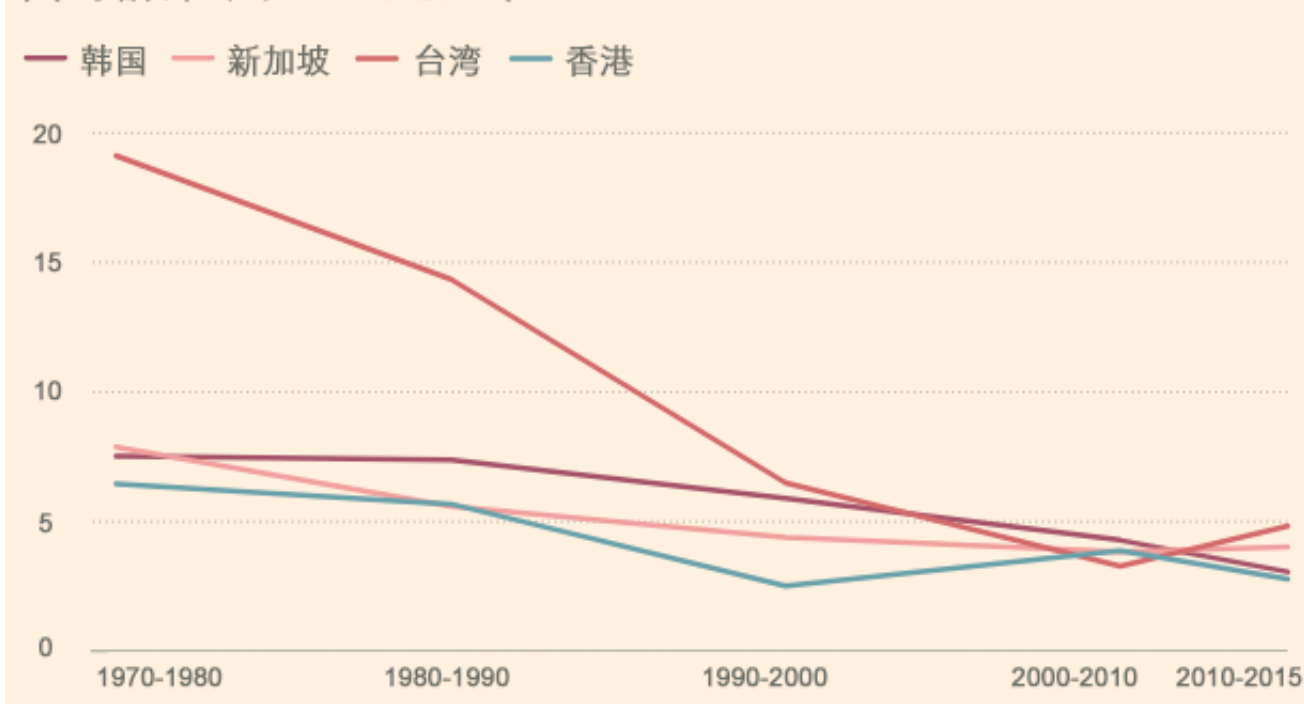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

FT中文网

同期，香港的房價已經攀升至匪夷所思的程度。國際房價負擔能力報告(Demographia International Housing Affordability Survey)的數據顯示，2016年第三季度香港平均房價是本地家庭年平均收入的18.1倍，即一家人不吃不喝18年方能“上樓”（買房），年輕人無法置業。上述問題所衍生出的是一個日漸分化、充滿隔閡的社會：泛民與建制派，新移民與老香港人，精英與草根之間互相對立。類似的情形同樣在美國、英國、台灣、韓國等地產生。我將它稱之為“高收入陷阱”——這個問題在高收入經濟體的四小龍最為顯著，他們都在發展至一定程度之後經濟成長開始放緩（下圖圖二），各種社會問題接踵而來。

亚洲四小龙人均GDP增长对比

年平均增长率（%），1970~2015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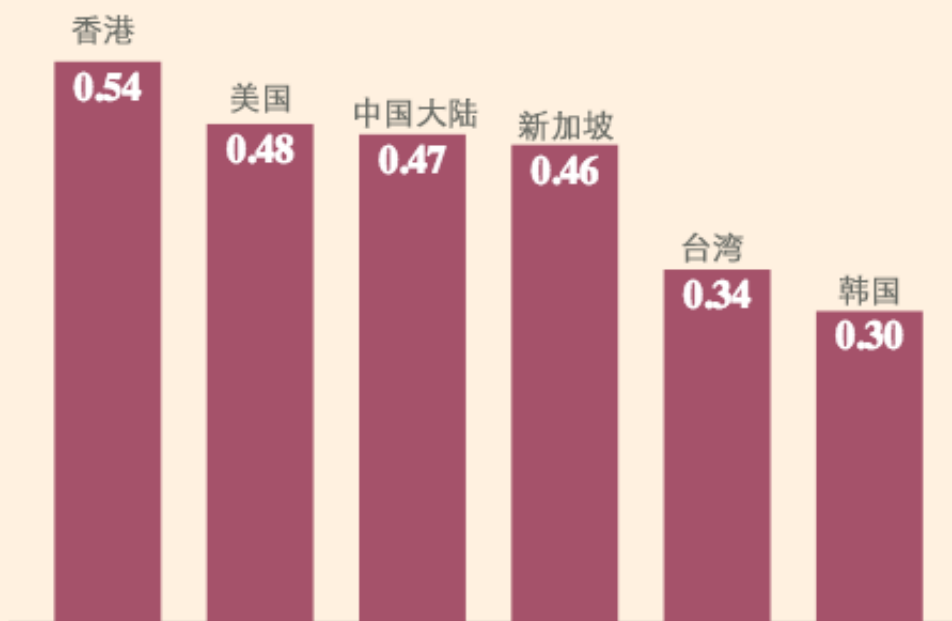
来源：世界银行、中华民国统计资讯网

FT中文网

落入“高收入陷阱”的社會普遍面臨的問題包括生育率下降、房價高漲、年輕人發展機會受限、社會貧富懸殊日益嚴重。根據香港政府發表的住戶收入分布統計報告，2016年香港的基尼係數為0.539，已達到45年以來

的歷史新高，其不平等程度位於世界發達經濟體之首（圖三）。這樣的地方對任何領導人都是巨大的挑戰，更何況在一個缺乏民主代表性的機制下，不同利益群體的訴求難以發洩，彼此之間的矛盾也更難於化解。

基尼系数对比



* 台湾与韩国的数据为2015年，其余经济体的数据为2016年。

来源：各经济体政府统计部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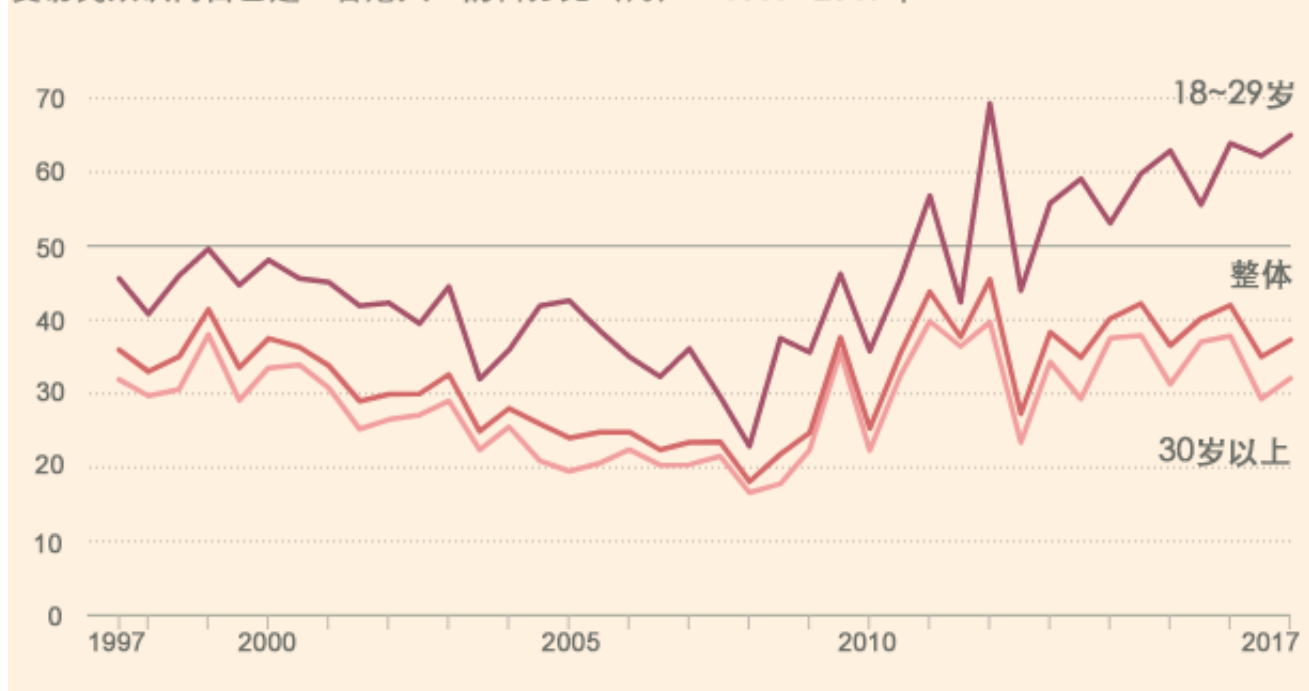
FT中文网

身分認同的代際分歧

伴隨這些經濟問題而來的是認同的改變。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數據顯示，近年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沒有受過英國殖民教育的一代）對“香港人”身份認同感不斷加強，僅有3%的年輕人認為自己完全是中國人。持有強烈“香港人”認同的年輕人數量是老一輩的兩倍（下圖圖四）。三年前的香港幾乎沒有人主張“港獨”，而現在儘管大家都知道“港獨”沒有出路，這一議題還是引發年輕人的關注，“本土派”隨之產生。同期大陸在其他城市推行高壓的政治管治，言論自由被扼殺，也引發香港人的反感。因為缺乏民主代議制度，以年輕人為主的社群無法將自己的認同和訴求有效表達，只好訴諸極端立場，以彰顯自己“與大陸有別”。老一輩香港人覺得香港最珍貴的是法治，年輕人覺得香港的核心價值是對民主的追求。這是一種著眼於身份認同的抗議，也是代際之間的分歧。

香港年轻人有相对强烈的“香港认同”

受访民众认同自己是“香港人”的百分比(%)，1997~2017年



来源：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FT中文网

認同的另一個指標是對憲政體制的信任。香港大學的民調也追蹤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任度與不信任度，二者之差即是“信心淨值”。回歸時，有信心的人比沒有信心的人多三成（下圖圖五），2008年前後，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高漲，信心淨值超過五成；而從2014年“雨傘運動”以來，香港人的信心跌至回歸以來最低谷，這一指標出現負值，直到現在都低過2003年沙士(SARS)恐慌時期。不信任“一國兩制”的香港人越來越多，不少香港人認為“一國兩制”的根基正在被逐漸侵蝕，不用等到2047年便會告終。

香港市民对一国两制的信心变化

信心净值（有信心减去没信心）%，1997~2017年



来源：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每半年总结一次统计数据）

FT中文网

參照台灣在與大陸進行經濟集成過程中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身份認同和核心價值的爭議會讓激進的政治

立場得到驚人支持，利益分配不均等經濟問題更會火上加油。所以陳水扁時期，台灣對大陸經濟政策就在極端選項之間搖擺。但是過去這十年，台灣認同一旦鞏固，大部分選民都覺得自己是台灣人，台灣的大陸政策反而越來越理性。國民黨在2014年草率通過的服貿協議最終被大眾阻止，民進黨去年再次執政後對大陸態度也遠比過往審慎。因為人民“話事”，兩黨政策搖擺的空間有限，會越來越往中間選民靠攏。這種政經分離的趨勢在台灣年輕人中最为明顯。在兩岸經濟、社會交流加深環境中成長的台灣年輕人，對大陸就業機會並不排斥，但同時他們正是“天然獨”的一代。我們常聽說大陸經濟成長會導致年輕人自然接受中國人的認同，其實，當具有不同價值觀的社會發生碰撞時，經濟問題更會導致大家對認同的分歧突顯，而認同是不會因為商業往來而自然結合的。

在過去，香港人較為務實，善於將身份認同和政策偏好分開；而台灣則一度因身份認同的極端化導致相關經濟政策不能在理性的環境下討論。如今，台灣社會三十年來在身份認同和對大陸政策的激辯，在短短三到五年內搬到香港上演，兩地的社會氛圍正好調轉：台灣社會在民主機制下的反覆討論中不僅鞏固了台灣認同，也形成了基於“台灣優先”而對大陸經濟政策、尤其是兩岸制度化協商的共識和支持；香港則在最近陷入日益頻繁的認同、所以對任何和大陸有關的政策都備受爭議。即便是那些經過周密思考、對香港經濟有益的政策，也同樣會招致部分香港人的不滿。

不必為香港未來過於悲觀

雖然香港是個移民社會，大部分人都是從大陸陸續過來，但以前來的移民都要接受香港價值的洗禮，現在則是新移民——無論菁英或基層，似乎都在改變香港的價值與文化。過去，治理香港的多是相當有能力及經驗的人才。現在，香港人覺得香港正被來自內地的新移民佔領，不是炒樓的富豪、就是排隊等公屋的家庭，讓本地人覺得有限的資源被搶佔。而政府要員比較看重的是如何揣摩北京的意思來管制特區，沒有把香港的老百姓的苦衷轉述給北京。這對香港人來說實在難以接受，也極具諷刺意味：“一國兩制”本是鄧小平為實現統一台灣量身定做的，但如今香港的模式對於台灣而言毫無吸引力。

身份認同問題導致政策偏好極端化的例子在香港已經不少，但爭議將會越來越多。例如林鄭月娥提出的“西九龍故宮文化博物館”計劃，這一計劃或許有利於香港吸引更多遊客、豐富香港社會文化生活，但很多香港人卻視為暗箱操作，有悖香港精神，這正與台灣反服貿的“太陽花學運”相似。香港社會對“廣深港高鐵”採取“一地兩檢”安排的爭議又是另一個代表案例：這一項目將內地和香港更緊密聯繫在一起、甚至允許內地執法人員前來香港執法，這會讓爭議更加激烈。即便這條鐵路有利於香港經濟發展，香港人卻只看到跨境執法如何的觸及“兩制”的底線。在未來，林鄭月娥將會持續面臨類似的治理挑戰，尤其是在處理與立法會關係和推動政策出台方面，她的處境與當年台灣的陳水扁其實頗為相似。日前林鄭月娥接受大陸官媒採訪時甚至表示，要從幼兒園開始培養小朋友的中國人認同，這只會引發香港社會更強烈反彈。身份認同是勉強不來也壓制不住的，香港年輕人“反國教、撐普選”，就是在用看似極端的手段來強調身份認同和價值觀。

如今的香港與三十年前的台灣在社會極端化方面如出一轍，但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大陸中央對香港的制度有著高度干預的能力，例如行政長官選舉。十九大之前，中央一定會繼續堅持對港台採取強硬立場。對中央政府而言，還有太多比“了解港台社會變化的細節、制定好的政策”更迫切的事情。在他們眼中，讓香港服從管治比為香港社會帶來切實變革更為迫切。但是，經歷過三個北京欽點、不是坐牢就是極度不受歡迎的特首之後，中央繼續為強硬派候選人背書只會讓問題的雪球越滾越大。如同梁振英一樣，林鄭月娥深知北京是她權利的來源，所以不太可能去修補香港不同社群、不同代際之間的分歧，而中央很可能繼續現有的香港政策，讓建制派陣營享受經濟利益，對其他社群呼籲推動政治改革、捍衛香港自主性的聲音置若罔聞。

當然，將地方政府施政過程中的問題一律歸咎到中央是一種誤導。香港要跳出“高收入陷阱”，解決社會不平等問題，也要面對認同的分歧。這一切都要從凝聚社會共識開始，而這正是香港政府未能做到的。但中央對港澳台事務缺乏關注的確是導致問題惡化的重要原因。雖然大陸港台事務專家充分了解到這幾年年輕人的趨勢，但中央政府在處理對港台問題時始終處於守勢，一旦發覺情況不妙就採取強硬立場，結果適得其反。遺憾的是，如果中央尚未意識到政策調整的必要性與迫切性，香港也將面臨日益極端化的社會。人非草木，要強行將一個長期與大陸分隔、貧富懸殊，保有自己獨特文化歷史記憶的社會加以融合，本非易事，更何況大陸自身經濟挑戰巨大。

不過，正如我們不應在1997年時過於樂觀、篤信“馬照跑、舞照跳”，我們如今也不必對未來過於悲觀，畢竟“一國兩制”是一場獨一無二的政治實驗。今天一些中央政府官員、內地不少年輕人以及香港人都認為“一國兩制”是失敗的，北京怪香港“不夠聽話，不感激”，而香港人則擔憂中央已經打破對“高度自治”的承諾，香港自主性不受保護，雙方的認知隔閡正在不斷增加。但是，香港社會有很強的韌性，善於靈活應變。我也相信，香港年輕人有著強烈的參與熱情，希望香港會發展得更好，所以才走向街頭。我一直鼓勵我的學生們熱心關愛自己的社群，儘管每個人對“社群”的理解或許不一，如果香港年輕一代有心關注公共政策、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來回饋社會，那麼或許他們會帶領香港，以公平正義為基礎，定製好的公共政策，走出“高收入陷

阱”，創造一種具有包容性、富於同理心的香港。包括我在內的無數香港人正是因此將這裡視為自己的家，為香港感到驕傲，我們自然也有責任讓她在未來走得更好。

(作者目前同時任教香港中文大學及美國弗吉尼亞大學。過去曾任高盛集團合伙人，也是阿里巴巴、中芯國際董事會的創始成員。最新著作《台灣的中國兩難》(Taiwan's China Dilemma, 中文書名暫譯)，中文版預計九月份在台灣出版。個人網站：www.shirleylin.net。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責任編輯：silva.shih@ftchinese.com)

本文的網址：<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3173>

更多相關文章

如何找到更多此類文章

1. 訪問FT中文網首頁(www.ftchinese.com)
2. 本文涉及的話題標籤包括：[香港回歸20周年](#)、[香港](#)、[一國兩制](#)、[香港經濟](#)、[亞洲四小龍](#)。您可以在www.ftchinese.com上的搜索框進行搜索。
3. 在谷歌和百度上輸入[落入“高收入陷阱”的香港 [site:ftchinese.com](http://www.ftchinese.com)]。

未經英國《金融時報》書面許可，對於英國《金融時報》擁有版權和/或其他知識產權的任何內容，任何人不得複製、轉載、摘編或在非FT中文網（或：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所屬的服務器上做鏡像或以其他任何方式進行使用。已經英國《金融時報》授權使用作品的，應在授權範圍內使用。